

目 录

- 001 : 略述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
- 007 : 略论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
- 014 : 敦煌文学中的表、疏作品
- 022 : 敦煌文学中的书、启作品
- 029 : 敦煌诗赋作品题注
- 036 : 敦煌歌辞作品题注
- 044 : 敦煌说唱作品题注
- 051 : 敦煌小说作品题注
- 058 : 敦煌史乘散文作品题注
- 066 : 敦煌应用散文作品题注
- 079 : 敦煌书仪文学概论
- 120 : 敦煌军旅文学述略
- 133 : 敦煌文学的价值及概念再议
- 141 :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语言文学组活动述评

- 146 : 附录
- 146 : 舞剧文学的宏构巨制
——对舞剧《丝路花雨》评论的思考性回顾
- 155 : 发扬敦煌文化优势,促进地方文明建设
——敦煌文化普及与开发研讨会述评
- 164 : 在兰州建设“敦煌壁画建筑景观园”的可行性理论探述
- 175 : 长安芙蓉园文化内涵表征叙目
- 190 : 后记

序

颜廷亮

我和杜琪同志在同一单位从事敦煌文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在长期共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杜琪同志为人正直，待人热诚，做学问功底厚实，思维敏锐开放又善于独立思考，所发表的文章多有见地。近几年间，我由于已经退休，不大能碰见他。大约在一个多月前偶然相遇，他告诉我，说是拟从自己已发表的有关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中选出若干篇，汇为一集出版。我觉得，这对于作者自己还是我们的学科建设都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所以很高兴，极望他能尽快将论文集编成。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已大致编好，将要出版，希望我为他的论文集写篇序。我自知学问有限，向来不敢为他人著作写序，也的确很少为他人著作写序。但这一次例外，接到杜琪同志的电话，我很乐意地答应了。这自然不是自以为有什么资格，而是有着和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相关的原因。

近几年来，在好几个场合，我都讲过：目前敦煌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中，有一个就是应当把理论层次的宏观研究尽快提上日程。不久前，我在一个小型学术报告会上，曾就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谈了一些看法，其中又一次讲到这一层，并鼓励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志要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这是因为，就敦煌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理论层次的宏观研究确实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事实上，多年来，在整个敦煌文学研究界对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注意相当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甘肃省社科院将敦煌文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加以建设以来，一直是在有意识地将这种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作为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并在季羨林、周绍良等先生的关怀、指导和省内外同行们的支持、协作下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还是在1982年,我们就曾邀集一些专家学者召开了一次“敦煌文学座谈会”,这是自十年内乱结束和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出版以后,再一次打出“敦煌文学”旗号的行动。之后,我们又依据周绍良先生《敦煌文学刍议》一文开辟的路径,组织编写了《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两部著作。当然,我们的这些工作都还做得并不怎么十全十美,但多少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其显著的表现就是,不仅“敦煌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基本上替代了“敦煌俗文学”、“敦煌通俗文学”、“敦煌民间文学”等,而被普遍接受开始和广泛流行,人们对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的认识视野愈为扩大,而且还对在文学史上几乎已成思维定势的某些观念有所校正。比如,在李斌城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化·文学编》中,我们就欣喜地看到,作者不仅多处特别强调敦煌文学对认识了解有唐一代文学发展状况的作用,而且在文学范围的确定上也吸收了我们在《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中的做法,把“唐时流行的一应实用文体(诸如制诰、策问、判、表、笺、状、书、疏、序、论、颂、赞、箴、铭、碑、志、祭文之类,无论骈散)均作为研究和考察对象”。显然,我们当初在敦煌文学这一方小池中投下的一颗石子,的确在更大的湖泊中激起了涟漪,我们是深以为幸的。但可惜的是,在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支敦煌文学的研究队伍,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几近解体;杜琪同志虽然没有离开单位,也未放弃敦煌文学研究,但却远赴西安,主要用力于其他课题。在我退休前的几年中,唯剩我一人单打独斗。我们所开创的很好的一个局面没有巩固坚持下来,从理论层面进行宏观研究自然也未能怎么进行。虽然敦煌文学研究界也还有人进行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但整个说来,此类研究相当薄弱的状况并无根本性改变。好在最近几年,我们院的领导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相继调入了几个年轻人,杜琪同志又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到敦煌文学研究方面,我们的队伍又开始聚集起来,并决心继续在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方面开展工作,和敦煌文学研究界的有识之士一起,努力扭转理论层面宏观研究不怎么引人关注、不怎么景气的局面。杜琪同志本来就长于理论思辨,在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方面做过许多工作,现在又有几位新同志加入,我相信,这支队伍一定会和敦煌文学研究界的有识之士一起,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做出新的贡献,开创出我国敦煌文学研究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又有理论层面的宏观研究的大好新局面。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一个敦煌文学研究领域的老兵,我当然十分高兴,因而也就乐于为他的论文集写篇序文,算是为杜琪及其他几位同志摇旗呐喊、助助威吧!

杜琪同志的这部论文集,我想读者读后一定可以明显看出,书中所收均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论文。其中,涉及敦煌文学研究的多篇论文,显然是沿袭着我们过去在学科建设上的主要方向撰写的。比如,他的一组“作品”题注,就可看做是他在其前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思考,其中对于敦煌文学作品的分类就不乏自己的一些新的创见;他的《敦煌书仪文学概论》一文,较之他在为《敦煌文学概论》所撰写的相关章节中的论述就更加完备;他的《敦煌军旅文学述略》一文,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敦煌文学的价值作了论述。我以为,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关于“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应当如何界定的问题,杜琪同志是有自己的见解的。本来,我在《敦煌文学概论·前言》及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对“敦煌文学”概念已经作过界定,但杜琪同志经过深入思考后,在论文集所收《敦煌文学的价值及概念再议》一文中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且不管我们的看法哪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历史实际,但就此现象而言,也表明他在敦煌文学宏观理论研究方面还在进行着深入的探讨。应当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一种在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允许、而且应当大加鼓励和提倡的现象。我从内心深处希望这种现象不仅在有关“敦煌文学”概界问题上,而且在有关敦煌文学的一系列大的或者小的理论问题上,都能够得以持续,并在我们这支新的研究队伍和敦煌文学研究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新的成果。

杜琪同志这本论文集还收有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即《在兰州建设“敦煌壁画建筑景观园”的可行性理论探述》,其中所述是关于敦煌文化开发和利用的很有价值的一个创意,也使我再一次想起季羨林先生。按说,一般求诸大家为一个建设项目题名,都是在这个建设项目已经开工甚至是即将实际运作开业的时候。所以当初杜琪托我求正在医院休养的季老题写园名,我是很觉得有点唐突的。可没想到的是,当我说明情况之后,季老竟是那样的豁达大度,对秘书一句“别再问,把纸笔拿过来”,然后就立即挥洒而就。如今,一代宗师已经魂归道山,展读墨迹,当日的场景仍是历历在目;而这个“敦煌壁画建筑景观园”却还是泥牛入海,何时能造福桑梓还遥遥无期,不由人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前面已经说过,我确实很少为他人著作写序,因而也不善于写序。以上文字,只是随手写来,未必合适,姑且作为对杜琪同志这本《敦煌文学论集》的出版的祝贺吧!

2009年11月16日于兰州

略述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

唐、五代以至宋初，甘肃文学有一个极易为人们忽视的重要方面——这就是珍存于敦煌遗书中，从其署名、题记、内容或可判定为这一历史时期甘肃籍作者和外省籍旅陇作者的文学作品。

自从汉武帝开通西域，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咽喉的边鄙敦煌，就日渐兴盛起来。历经数百年军屯民垦的农业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商业滋润，这里不但经济丰饶，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成为“郡大众殷”、“人物敦雅”（《晋书·李玄盛传》）的人文荟萃之区。汉晋以降，这里既出现过张奂、索靖、宋纤、刘昉、郭瑀一类于阐扬中原传统文化学术多有贡献的学者名儒，也出现过竺法护、竺法乘、宋云一类于推行经法广流中土甚为用力的释子高僧。绚丽多姿的石窟艺术和包罗万象的藏经洞遗书，更历史地标明了敦煌社会文化的辉煌成就。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宋初时期的甘肃文学作品，正是依托着这样一个深广的文化背景而发生的文学活动的子遗。

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作品的蕴藏十分丰富，不光数量可观，内容广泛，形式亦复杂多样：计有诗、赋、散文、歌辞、俚曲、变文、佛赞、颂偈等等。这里仅择其主要略为叙述。

在诗歌作品中，最著名者为 P·2555 卷之敦煌唐人诗和 P·2748 卷之《敦煌甘咏》，二者均已经王重民先生整理逐录于《〈补全唐诗〉拾遗》。P·2555 卷之敦煌唐人诗共七十余首，依据诗的内容看，作者系两位被吐蕃军队拘羈的汉族土人，写作年代约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河西渐陷吐蕃而沙州尚

存之际。两位作者或因“战苦不成功”而成俘囚，或因“邂逅遇迺蒙”而遭缋继，以致被强制流移他乡。这些诗篇是他们苦难境遇中的哀歌。他们触物伤情，借景抒怀，既倾吐了思乡怀国的忧愁怨愤，也表述了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其沉郁的心境，深挚的情感，颇能反映出当时陷身于西北民族战乱中一些文人士子的思想面貌。如《被蕃军中拘係之作》一诗写道：

何事逐漂蓬，悠悠过番空。世穷逢运蹇，战苦不成功。泪滴东流水，
心随北翥鸿。可能忠孝节？长遣因西戎。

交织于诗中的孤漠、感伤、惶惑、犹豫的复杂情绪，正是一个“落蕃人”的典型心态。同时，这些诗也是一些很有特点的边塞纪行诗。如写牧野秋色：“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暝草寒。谷口穹庐遥迤迤，溪边牛马暮盘跚。”（《晚秋登城之作》）写汉唐戎关：“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日白草遍地阴。隗墉穷巷无人迹，独树孤坟有鸟吟。”（《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这些描写游牧地带自然风貌和边守废弛破败景象的动人诗句，在唐人一般边塞诗中还似无多见。这七十余首诗作语言朴素古拙，写景抒情意象浑一，显现于诗中的“落蕃人”形象，真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陈衍《宋诗精华录》尝誉陆游的爱情自哀诗“沈园”三首：“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以此形容两位“落蕃人”的诗作，亦不为过论。这些诗的缺点是个别词语生涩拗口，有的今体诗也不太合乎韵律。《敦煌廿咏》的成诗年代，根据诗中引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弃胡塞”“还帝乡”故事，以及对贺拔行威“割据王敦煌”历史劣迹的叱责和“不见中华使，翩翩起虏尘”的形势描写，似应在张奉承“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旧《五代史》吐蕃传）时期。诗前序云：“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究竟，聊申短咏，以讽美名云尔矣。”这就既透露出作者是久居敦煌的士子或学人，又说明其写作意图旨在歌咏敦煌地方风物。这一组五言律诗，笔墨精细有如山水轴幅，形象流动有如风景卡通，敦煌地区廿处名胜景观的雄姿秀色，在诗人笔下尽得妙韵。如描绘鸣沙山之神异：“势疑天鼓动，般似地雷惊。”（《白龙堆咏》）描绘莫高窟之瑰丽：“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莫高窟咏》）描绘分流泉之奇绝：“一源分异派，两道入汤池。”（《分流泉咏》）描绘水晶堂之玉美：“体明同夜月，色净含秋霜。”（《水晶堂咏》）描绘湿洼天马之骏逸：“花里牵丝去，云间拽练来。”（《湿洼天马咏》）但这些诗又并非是纯粹的风景诗。作者凭吊古迹，追怀先贤，不独表现出对于敦煌乡土的真情挚爱，也往往流露出郁郁

不志的孤漠心情。《瑟瑟监咏》中他叹息：“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贞女台咏》中他悲愤：“二八无人识，千秋已作灰。”就此我们还可对作者的身世推想一二。而《贺拔堂咏》对唐初叛将贺拔行威的尖锐批判，无疑亦隐含着作者对当时统治者的劝谏讽喻；《望京门咏》通过对眼前景物的吟咏，又寄托着作者深沉的爱国情怀。这廿首诗作气韵贯通，语意幽远，用字洗炼，对仗工稳，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和对敦煌史地的丰富学识，足以说明敦煌唐人诗歌创作有着相当的水平。除上述两者之外，还有一些诗作亦需注意。有描写西北边地风土的，如S·6234卷的《酒泉》《西州》《秋日茂葵》和P·2762卷的《胡桐树》《焉耆》《平凉堡》等诗题；有吟唱僧侣宗教生活的，如S·1947《送师赞》和S·4277卷的“禅诗”等；有表现时俗世态的，如S·6234卷的《因国(?)十一求干脯》《问友人疾》以及写于一些文书卷后的抄书手即兴诗等。其中又以那些“禅诗”和抄书手诗尤为宝贵，前者揭示了僧侣生活的隐秘内情，后者则反映出敦煌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些特殊现象，对于认识当时的敦煌社会生活面貌，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敦煌歌辞之被发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些歌辞，不仅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拓展了古代文学的领域；而且还从自身体例的构造演变中，证实了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解决了词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在全部敦煌歌辞中，属于甘肃文学范畴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其大多结合着敦煌“地邻蕃服，家接浑乡”（P·2005五卷《沙州都督府图经》）的方舆特征和时代背景，真实地表现了敦煌社会的重大题材——民族关系问题，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甚或誉为“词史”而与杜甫的“诗史”相比拟。例如P·2506伯卷的两首〔献忠心〕（“臣远涉山水”“暮却多少云水”），即以蕃臣戎将的“乡音”颂唱：“生死大唐好”，“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一方面表达了边疆兄弟民族奉唐正朔、致力国家统一的真挚感情；一方面也反映出盛唐时期边陲安静、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气象。而P·3128卷的四首〔望江南〕，则又深刻地揭露了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尖锐激化的民族矛盾。“曹公德，为国拓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曹氏政权的“殊勋”之后，势必隐藏着对于兄弟民族的弹压杀伐；“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每恨蕃部生留滞，只缘当路寇讎多。”蕃部政权的袭扰劫夺，又可见出民族失和的战乱时局给予敦煌民众的沉重苦难。这些曾经回响在历史长空的塞声边音，既真实地记述了封建制度下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史实，也生动地再现了敦煌社会广阔的边塞生活图景，为敦煌社会研究及河西民族历史研究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这些歌辞风格朴拙，情感率直，“词不华藻，然意真字实”（王重民

《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具有敦煌乡土和人物的独特气韵。如 S·2607 卷的[赞普子]:

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

一阙短歌明白如话,却把兄弟民族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坦荡粗豪的情怀描绘得生动而真切。这些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无疑是敦煌歌辞中的珍品。

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散文作品,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比较重要者如 S·343 卷的《都河玉娘子文》、S·3702 卷的《讲经和尚颂》、S·5448 卷的《敦煌录》、P·2718 卷的《茶酒论》、P·2992 卷的《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P·3718 卷的《敦煌名人名僧遯真赞》以及众多的佛事“功德记”和书仪作品等。这些作品除《茶酒论》之外,虽然多系实用性文件,但都具有一定的文字水平,不乏文学意味。其中之佼佼者,与一些传世佳作亦堪媲美。如《都河玉娘子文》,就是一篇祭祀神灵的文稿,不但语言生动瑰丽,且想象力极为丰富。敦煌人民的“生命之水”——都河,被作者描画成一位朱唇云鬓面若芙蓉的“玉女娘子”,这位年轻貌美的司水女神“吐苍海,泛洪津;驾云辇,衣霓裙”“喷骊珠而水涨,行金带如飞鳞”;可以使“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雨,地涌甘泉”。其形象,真有着湘夫人、洛神一般的柔情绰态。又如《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语句恺直朴恻,慷慨悲凉。或述民族战争之若难:“沿路州镇,迺遭破败,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或谴责异族统治者之无端扰攘:“不曾省与天可汗有煞父害母之仇,何故频行劫煞?万姓告天,两眼泣血!”或写冀求干戈之平息:“如渴思浆,如子忆母。”通篇语意恳切,不亢不卑,绝少一般士大夫应制文字的陈辞滥调。再如 P·2555 卷之《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虽属骈体外交辞令,然辞采斐然,对仗工稳,叙事达情酣畅淋漓。读来跌宕起伏,音韵铿锵,有着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补入《全唐文》亦不失为一篇好文字。而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方面来讲,由于和敦煌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关系直接,所以更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征,对于敦煌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就更为具体,更为本质。《茶酒论》署名“乡贡士王敷撰”,是一篇语调诙谐有趣的赋体寓言。通过茶酒相互争功的驳议,说明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离开了“亦能浮荡天地,亦能润煞鱼龙”的水一般平凡的人民大众,都将一事无成。并以此对“神农尝百草,五禾从此得分;轩辕制其衣服,流传教示后人。仓颉致其文字,孔丘阐化儒因”等英雄创造历史

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这种先进的思想寓意,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贵的。而它的影响,也远及卫藏。后来流传于西藏地区的藏文本《茶酒仙女》,不管从篇名、文体、故事情节,都可以明显看到脱胎于敦煌本《茶酒论》的痕迹。这说明它的文学成就,早在封建时代,就已为各族人民所公认。

变文的形成,与普及佛典教义的“俗讲”有着密切的关系,历经发展,遂成我国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样式。“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作为西域佛教东渐而入中国的重要站口,敦煌社会佛教滋蔓昌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而敦煌遗书中留存有大量的变文资料亦不为奇。在敦煌变文作品中,明显为敦煌僧俗创作或加工者计有五篇,即S·3491卷的《频婆娑罗王后子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P·2187卷的《破魔变文》、P·2962卷的《张议潮变文》、P·3451的《张淮深变文》和P·2808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均可见于王重民等人编录的《敦煌变文集》。在这五篇变文中,尤以《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弥足珍贵。两者虽都已残缺不全,但现存文字,仍不失为两篇气势雄浑的英雄史诗。张议潮叔侄崛起民间,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率领敦煌人民起义,驱逐了吐蕃守将。遂所向披靡,次第收复了河陇大片土地,“驰表函入长安以献天子”(S·339卷),这一消息,曾使都城人民万众欢腾。诗人杜牧以“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的动人诗句,记述了当时庆祝的热烈场面。这两篇变文,正是以张氏叔侄的英雄事迹为题材,讴歌颂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作品雄文劲采,气势恢宏,如写战争:“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红旗,动鸣鼙,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军雄豪百当千。”“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铓陪土土,血溅戎尸透战袄。一阵吐浑输欲尽,上将威临煞气高。”(《张议潮变文》)叙事层次分明,言简而意赅,如写朝廷使臣入开元寺拜谒玄宗塑像:“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象。其他四郡,悉没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泪垂;左右参从,无不惨枪……”(《张淮深变文》)最可贵的是,作品还能够从事件发展过程中,以人物的语言行动,较为成功地塑造出主人公勇谋兼备、刚强决断的性格特征。如《张淮深变文》:

尚书既闻回鹘□□□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謀张大庆越班启曰:
“金□□□,兵不可妄动。季秋之行,兵家所忌。”尚书谓诸将□:“□□失

信，来此窥觐。《军志》有言：兵有事不获而行之，□□□事不获矣！但持金以压王相，此时必须剪除。”言讫，□□□军，誓其众曰：“回鹘新受诏命，今事背恩，理合扑灭，以雪朝庭之愤。将士勉怀尽节，共扫□□！”传令既讫，当即点兵，凿凶门而出。

这一段文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张淮深这位塞表英儒的感人形象，极富小说笔法。总而言之，这两篇变文不但艺术技巧成熟，且能够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为依据，因此是在敦煌变文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其他作品，均以演说佛故事为内容，但在《破魔变文》首尾有颂唱曹议金之文字，在《频婆娑罗王后官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卷首有颂唱曹元忠之文字，结合文中的内容来看，无疑是以佛陀之仁慈和频婆娑罗王之贤明与归义军后期的曹氏政权相比附。这些作品想象奇瑰，比喻巧妙，既有大胆的夸张描写，又有大肆排比重沓的文字风格，在艺术手法上，都颇具佛典文学固有的某些特点。

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规模宏富，内容广泛，佳作名篇述不一一，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事实，充分显示了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地区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景象。就其思想成就而言，虽然糅杂有一定的封建意识或宗教观念的糟粕，但是由于作者多系不见经传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又久居敦煌地区，所以对敦煌乡土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敦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因此，这些作品中又蕴蓄着较强的人民性及民族精神。如歌辞《望江南》（“敦煌郡”），其中所包含的厌憎战争苦难的思想情绪，便很能代表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内心呼声；“落蕃人”的诗作和《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的民族精神，爱国热忱，更是从不多见的角度真切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人们的民族心理和国家概念。就其艺术成就而言，由于这些作品多直接关涉敦煌社会史实，实用于生活实际，结合着敦煌社会的地域特征；所以其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强烈的地方色彩，都是十分鲜明的。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敦煌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也充分地体现了敦煌社会文化的历史特征。因此，这些作品既于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宝贵的历史价值，又于古代甘肃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亦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些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将使我们进一步发展繁荣甘肃地方文学，开发建设西北文化事业，获得直接的历史借鉴。

略论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

在浩繁的敦煌遗书中珍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学典籍，而在这批文学典籍中，甘肃籍作者和外省籍旅陇作者的作品又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在述及甘肃文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作品的客观存在。同时，由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乃至艺术风格，都和甘肃地域的、历史的某些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生动真实地展现出唐五代以至宋初时期敦煌地区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而且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敦煌历史上社会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就更应视其为甘肃文学的瑰宝。对这些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评介，无疑会对我们了解甘肃文学发展历史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的同志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即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对于有关问题的进一步论说。

一、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溯源

如同一切文学现象都必然是依据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发生一样，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也应当是与之相应的敦煌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产物。因此，当我们想要对这些作品有所说明时，就不能不首先追溯到敦煌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成。

上古的敦煌，原是我国西部一些游牧民族时或居之的地区。迄汉通西域，敦煌很快即成为西汉王朝羁制西域诸国的政治军事重心，而由于政治军事活动的展开，中原文化势必迅速流播开来。其后，又因为西汉王朝采取了驻兵屯戍和移民实边的战略措施，敦煌即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内地移民为主体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原文化

的基因也就不断地得以强化和扩大,不仅终于使之成为敦煌社会的主体文化,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日益繁荣而渐趋成熟,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比如,东汉时就有著名的文化人物张奂,曾位列九卿,著《尚书记难》三十万言,生徒达千人;其子张芝、张昶也均以书法名世。西晋时又有索靖、汜表、张彪等五人“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1]这些学子士人的出现,充分说明中原文化已在敦煌深深扎根。迄止永嘉丧乱,黄河流域战祸频仍,迫使内地人士大量迁徙河西。其时先后统辖河西的几个政权,对于中原文化又尚能取欣赏崇拜态度;特别是前凉国君张轨、西凉国君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2]这不仅使中原文化能够保存于河西敦煌一隅,而且也使敦煌社会的中原文化基础更为巩固。当时的敦煌,学者名儒荟萃,著述讲学之风盛行,彪炳史册者就有宋纤、郭瑀、刘昉等。他们既是博通经传、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又是收授生徒动辄数千百人的教育家。后来河西文化对于北魏以至隋唐时期的内地文化产生反馈影响,其中敦煌文化的力量当不可或缺。而这一切,自然成为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赖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

当然,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并非仅是以上述的文化基础为其产生的依据。我们知道,汉通西域也是中西交通的开始,而丝绸之路又有着文化运河一般的作用。所以,随着西方行旅的颠扑到来,盛行于西域诸国的佛教文化的波轮,也就泛及敦煌一带。据史载,西汉哀帝元寿年间,大月氏使者伊存曾在洛阳向博士弟子口授佛典;东汉明帝、桓帝时,又有印度及西域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娄迦讫等先后到洛阳讲译经论。这些人路经并驻留敦煌的史事虽无可考,但能够想见,他们既以光大佛法为己任,就不能不在敦煌留下法音的余响。同时,在这佛学东传阵容中的那些短途游化的西域僧人,更会视“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为广施教化的好场所。逮及西晋,这种自然的浸渗,终于在敦煌社会获得了足够的影响,于是便有诸习佛理的人物脱颖而出。先有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决心弘法,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佛典要籍一百五十余部,被时人称为“敦煌菩萨”“敦煌开士”^[3]。之后,竺法护的高足竺法乘则专志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4],为敦煌地方教化竭尽了毕生心力。到了五凉时期,由于敦煌地区和内地交通阻隔,客观上使得徐徐东渐的佛学影响相对集中,从而促发了佛教文化在敦煌社会的迅速滋繁。事实上,不但莫高窟的开凿滥觞于其时,而且《于阗佛曲》一类佛教音乐也开始流行。《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由此又可知北魏时期佛学蔓延昌炽于敦煌社会的状况。自北魏以降,仅从石窟艺术的繁荣景象即可看

出,佛教文化已在敦煌社会由扎根而开花结果了。尤其是中唐以后,敦煌沦陷于佞佛的吐蕃王朝达七十年之久,一时寺院倍增,僧尼云集,宗教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十几所寺院定期开设经场,还时有僧侣深入民间以俗讲形式阐释佛理,弘扬道法。此时的敦煌,真成了一座宗教圣城,佛学文化可谓恣意尽情地得到发展。至此,敦煌社会尽管有着汉晋以及五凉时期所奠定的丰厚的中原文化基础,也不能不在强大的佛教文化潮流冲击下接受影响,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不独表现在对于佛学思想的融汇和吸收上,而且也包括着对于中土文化固有形态的一些改变和发展。

总之,隋唐五代以至北宋初年,敦煌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接受了佛教文化巨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正是缘起于这样一个复杂而独特的社会文化基础。惟其如此,这一文学现象的地域及历史个性,才会表现得相当强烈和鲜明。

二、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之构成

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的构成情况较为复杂。就其形式而言,这些作品既有宗承我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体制的诗、赋、散文、歌辞、俚曲等,也有与佛典文学相关或是从其蝉化而来的变文、颂偈、佛赞等。这里,我们姑从这些作品内容上的特点出发分别部居,试对其基本构成情况作一简括的叙述。

敦煌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复杂而曲折,然而,从建郡之初即已形成的以内地移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却从无大的改变。因此,到唐五代时期其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尚保持着和内地社会大体一致的历史面貌。在敦煌遗书中,取材于此类生活范围的文学作品数量很多、内容亦很丰富。有描写歌咏敦煌一带地方风物的,如S·6234卷的《酒泉》《西州》《甘州》,P·2762卷的《胡桐树》《番河县》《平凉堡》,P·2748卷的《敦煌甘咏》,P·2555卷的《敦煌》《寿昌》等诗作,P·2488卷的《贰师泉赋》,S·343卷的《三都河玉女娘子文》,S·5448卷的《敦煌录》等散文。有记述颂赞俊杰名贤的,如P·2568伯卷的《南阳张延绥别传》,P·3128卷的[望江南]〔“曹公德”〕,P·2962卷的《张议潮变文》,P·3451卷的《张淮深变文》,P·2600卷和3645卷赞唱张议潮的两首俚曲歌谣,及辑存于《沙州文绿》中的不少墓志碑文。有反映世态人情及民事活动的,如S·6234的《因国(?)十一求干脯》和《问友人疾》,P·2555卷的《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题周奉卿》《途中忆儿女之作》《冬日野望》《闰情》等诗以及写于《禅宗安心义》和《逆刺占》卷后抄书手们的几首即兴诗,P·2718卷的《茶酒论》,P·3350卷的《下女夫词》,P·2936卷的《致女婿女儿书》,S·6537卷的《放妻书》等。也有直接关涉政治时局的,如S·4245的《归义军万人上表》,S·6242卷的《张议潮进表》,P·2826

卷的《赐张淮深札》，P·3260 卷的《归义军节度留后使曹元忠状》等。概而述之，这些作品或寄情于山川草木、古迹灵奇，以抒发对敦煌乡土的热爱，或通过对著名人物生平业绩，美德懿行的阐扬歌颂，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敦煌社会形势和生活事件；而世态人情及民事活动的形象反映和纪实，既体现了一般社会习俗，也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社会阶级内容。至于那些直接与政治时局相关的作品，则是对敦煌社会生活更为具体，更为本质的历史性记录。所有这些作品包含的生活内容，已基本上反映出敦煌社会的一般状况，从而成为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主要部分。

敦煌社会生活虽然与内地有着较多的同一性，但由于敦煌“地邻蕃服、家接浑乡”^[9]，且曾为少数民族政权一度辖辖，因而民族矛盾的缓解或危急，就必然对敦煌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民族关系问题就又成为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又一主题。比如 S·2607 卷的〔赞普子〕“本是蕃家将”，P·2506 的〔献忠心〕“臣远涉山水”，〔望江南〕“边塞苦”，P·3128 卷中的四首〔感皇恩〕等歌辞，即表现了边疆兄弟民族欣慕唐汉，渴望中华统一的美好心愿；P·2555 卷中之《胡笳第十九拍》《被蕃军拘系之作》《晚秋羁情》等五十余首落蕃人的诗作，P·3128 卷的〔望江南〕“敦煌郡”。P·3360 卷的失调名歌辞“十四十五上战场”，S·343 卷的《愿文稿》等则倾诉了敦煌人民处于民族战乱中的怨愤和忧虑；P·2005 卷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所录之歌谣，P·2555 卷《肃州刺史刘巨壁答南蕃书》，P·2864 卷的《白雀歌》，P·3033 卷的《龙泉神剑歌》，P·3128 卷的〔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P·3702 卷的〔几郎伟〕“十道销戈铸戟”，P·4967 的〔几郎伟〕“伏承大王重福”以及上文提到过的一些颂唱地方俊杰文事武功的作品，又反映和讴歌了敦煌地区军民反抗异族侵扰、英勇保卫疆土的斗争生活及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这一系列以民族关系问题为中心内容的作品，既抒写了各族人民冀求和睦相处，厌憎战争苦难的共同心声，也展现了敦煌社会广阔的边塞生活图景。无疑，这些作品是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又一重要构成方面。

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还有一个极可宝贵而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对宗教生活的描写和反映。实际上，这部分作品也很能体现出敦煌社会生活的特征。这不仅是因为宗教活动早已成为敦煌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是由于随着佛教文化对敦煌社会文化的日渐浸渗，在敦煌社会也早已形成了一个愈来愈庞大的僧侣阶层。在这部分作品中，有演述神佛教故事的，如 S·3491 卷的《频婆娑罗王后官彩女功德供养塔天生因缘变》，P·2187 卷的《破魔变文》等；有记述佛事活动的，如 S·2687 卷的《浞阳郡夫人翟氏布施疏》，S·4245 的《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P·3564 卷的《莫高窟功德记》等；有吟唱僧侣生活的，如 S·1947 卷的《送师赞》，S·

3702 的《讲经和尚颂》，S·4037 卷和 P·4277 卷的二十余首“禅诗”，S·5873 卷的二首《嘲胡僧诗》等。这些作品一方面说明僧侣阶层和敦煌世俗社会有着极深的联系，表现出佛教之所以昌炽于敦煌社会各种原因，另一方面也以生动的笔墨描绘出宗教生活的种种情态。尤其是那些反映寺院僧侣生活枯寂郁闷、精神幻灭的沙门禅诗，更是揭示了敦煌社会生活中最为隐秘的一面。

叙述至此，我们已大体上勾勒出了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整体面貌。就其基本构成情况而言，这些作品尽管艺术质量良莠不齐，思想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毕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五代以至宋初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现实，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其中的精粹之作，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破魔变文》《茶酒论》《下女夫词》《敦煌甘咏》《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P·2555 卷之唐人诗以及有着浓厚边塞生活色彩的歌辞等，不仅以其重要的思想内容，而且也以其内在的文化特性，既于甘肃文学史上辉煌夺目，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艺术特征

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构成情况固然复杂，从其内容方面考察，作者的生活道路及社会地位也各个不同，因此，思想倾向亦不尽一致。但是，作为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产物，这些作品就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这些作品大多继承了我国文学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能够广泛取材于敦煌社会现实事物，真实地反映出敦煌社会丰富多采的生活内容，而且能够通过对生活材料的记述和描写，较为深刻地揭示出敦煌社会历史的某些本质关系。如《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即以张氏叔侄坐镇龙沙，横戈大漠，率领归义军将士粉碎异族侵扰的英雄事迹为素材，生动地再现出当时壮阔的边塞战争生活，其中“头随剑落，满路僵尸”，“血染平原秋草上，满川流水变长红”的厮杀格斗的残酷情景，又形象地暴露出当时敦煌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尖锐的战乱局面。又如 S·343 卷之《愿文稿》，虽是一宗佛事活动的实用性文件，所表现的远征军人家属的苦悲心境，既已说明了长期的战乱和徭役加诸敦煌人民心身的沉重负担，也昭示出正是这种苦难的生活现实成为宗教得以滋繁的土壤。《禅安心义》卷后抄书手的即兴诗更具有典型意义，从短短的四行诗中，我们不但体会到敦煌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穷困窘迫的生活状况，也看到了敦煌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些踪迹。而 S·4377 卷中的八首“禅诗”，却又揭开了寺院僧侣生活的铁幕：这个所谓大慈大悲，一切清静的佛门圣地，原来也同样是一个“看面真如相，腹中怀羡慕。口共经文语，籍猫搦鼠儿”^⑨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黑暗角落。总之，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倾向，既增强了其

内容的生活含量,也使其思想主题进一步深化,对于我们认识敦煌社会生活的本质面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次,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又具有较为显著的通俗性质。从形式上讲,那些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歌辞、俚曲自不待言,即使如诗、赋、散文等作品,也由于作者大多为不见经传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有着较多的接触,受到一定的俗文学影响,因此而有着朴素浅近的语言风格,韵律格式亦多开放不羁。再如变文、颂偈、佛赞等作品,因为与佛典文学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而佛典文学原本就具有“宣唱法理开导众人”^[1]的化俗性质和目的,所以也业已成为民间文学一种新的样式。从内容上讲,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一般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如P·3350卷《下女夫词》表现的民间婚俗仪式,P·6537卷《放妻书》反映的封建家庭问题,失调名歌辞“十四十五上战场”抒发的士卒厌战情绪;P·3262卷《在千佛洞开窟作佛令祈愿文》记述的民众佛事活动等。这种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流通性,势必又决定着这些作品必须借助通俗的语言文字形式得以广泛传达。另外,这些作品大多和生活实际关系直接,如变文、颂偈、佛赞、祈愿文稿之于佛事法会;表、章、书、启之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歌辞俚曲之于群众性娱乐。这些实用特点,也是形成这些作品通俗性质的因素之一。

鲜明的地域色彩是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的又一特征。而这一特征又可以说是与上述两种特征密切相关的。即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对于敦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实质性的反映,我们才从中看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敦煌人”的形象,如率直坦荡的“蕃家将”,勇谋兼备的塞表英儒张淮深,怨愤不平的抄书手,思家怀国的“落蕃人”,热望“腾腾处俗间”^[2]的下层沙弥或是“冰谨专行”^[3]的有道高僧等。这些“敦煌人”的生动形象,以其特定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环境,构成了敦煌社会的时代风俗画卷,从而充分地体现了敦煌的方舆特征。同时,我们还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对于敦煌地区独特的地域形势的描绘,如《敦煌廿咏》《敦煌录》中所歌咏记述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沙州都督府图经所录之歌谣中展现的“四面六蕃围”“路远隔烟波”“地邻蕃服,家接浑乡”地理环境等。这些具体的地域描写,又十分典型地表现了敦煌地区的边塞风貌。又由于这些作品所具有的通俗性质,不仅说明了和敦煌社会文化的历史联系,而且更易于反映出敦煌社会的人情风俗。这种种原由,自然使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有别于其他文学现象,从而形成了它典型的地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是富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文学,它